

史学话语权与 20 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

——兼说 10 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吴怀祺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20 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变动, 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 中国史学进入到近代化时期。西方学术话语处在强势地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近代史学理论、思想的争论, 基本是按照西方的史学理论的热点而展开, 也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热点的变动而变动。这对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相关的史学认识有一定的意义, 但另一面是, 民族史学的重要思想失去应有的地位。传统民族史学思想、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 是西方史学理论不能完全替代的; 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 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是不利的。进入到 21 世纪, 史学理论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研究”。认真总结民族史学思想遗产, 对于当代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 是振兴民族史学的重要工作, 也是民族史学走向世界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史学话语权; 20 世纪; 中国民族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605X(2006)04 - 0005 - 09

The power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national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WU Huai - qi

(College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The Chinese society in the 20th century occurred great chan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end of western cultural thoughts the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nters to the modern age, which shows the western academical power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neglects researching traditional historical thoughts.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i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innovating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century to develop historical studies deeply.

Key words:power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the 20 th century; national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史学近代化与史学话语权的变动

10 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全书 300 余万字, 从 2002 年由黄山书社开始推出, 到 2005 年, 全书出版齐了。如果从书稿开始撰写、出版社组稿算起, 有十多年, 再往远一点说, 如果考虑各位作者相关学术的专门问题研究, 这套书前后经历近 20 年。应该说, 这是史学史学科建设上的一件重要事情。一本书或一套书的出版, 总是有自己的编撰缘起。这里有必要就这套书的编纂大旨, 谈谈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的遭遇和几个相关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 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在大变动的社会中, 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经历

了大动荡。学科发展经历的变化, 从古代学术向近代“转型”, 学科上经历了一次“重组”; 古代的“经史子集”的学问来一次“推倒重新洗牌”。近代历史学科与古代“史”有联系, 又有区别。近代史学学科是按西方的学科体系建立的, 和古代的“史”有联系, 但又不是古代“史”的直接延续, 其中有古代“经”、“子”等的学术因素在内。

讨论史学, 应当有比较, 但史学比较是两个 方面, 一是中西史学之比较, 讨论在西学的影响下, 中国史学发展的变化与中西史学的异同; 二是中国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的比较, 讨论近代史学与古代传统史学的不同与联系。而这二者又不能分割开来。在西方学术影响下, 中国传

统史学产生了变化,但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根基。而传统史学变化与外来的学术文化的影响,纠缠在一起。

一百多年来,史学理论发展深受西学的影响,史学走上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的道路^①。从世界范围说,近代西方学术处在强势的地位,他们在理论的阐述上,也是体现出一种“话语”的强权^②,一百多来,我们史家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史学理论的命题、框架,发掘新材料,重新解读古代传统史学,去思考,去争论、写作和研究。比如:

什么是历史?

什么是历史真实?

史学家能不能反映出过往的历史?

史学学科是怎样的一门学科?

历史学是不是科学? 历史学是艺术,还是科学?

历史研究法的特点是什么?

……

围绕这些问题,引发的相关问题就更多了:历史是进化的,还是退化或循环的? 历史的主体是什么? 历史可不可以提供借鉴? 历史可不可以认识? 历史学有没有存在的理由? 等等。

纷纷扰扰,一百年来中国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出不少宏论,提出无数答案;思考是认真的,其中不乏精见。通过讨论,开阔了视野,深化了思维,对传统史学的解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由此又引发各种争论,形成各种史学流派、思潮,这些是古代史学不曾见到的景观。

集中讨论这些问题的著作,大致可以归结:一为,《史学通论》、《史学概论》、《历史哲学》等。二为,《历史研究法》一类。三为,中外《史学史》^③。相关的论文数量很多;另外,其他各类史著中,也有涉及到类似议题的内容。

中国史学家渴求新知,在这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上,竞相展示自己的才华,提出各种看法,这本无可议论,但另一个普遍现象是,中国传统史学原有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被冷落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重大问题,同样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但是在学术领域内没有机会得以系统地展开讨论,表现出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这些重大思想问题很多,如:

——究天人之际的思想;

——历史发展大势的论述;

——历史盛衰论的通变思想;

——民本思想;

——实录、直笔论;

——史书的体裁、体例论;

……

这些问题涉及到宇宙观历史本体问题、历史主体问题、历史运动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史料学观点、史书编纂方法问题、史学社会功能问题,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难道没有意义吗? 但这些问题在西方思维方式下的理论框架内,很难展开讨论。

虽然一个多世纪来,有一些史家在自己的著作中讨论过,但总体来说,实在不相称。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很多思考。

是不是民族史学思想真的没有价值了? 我们在《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总论”卷中有初步论说,以后另写成专文。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在解决“什么是历史”问题上,一百年来,中外史学家提出的答案真是多如鸿毛。直到今天争论还在继续,争论是益的,但我们民族史学中,就有相对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古代文化史上,思想家有新的视角,把易学的变易、不易与简易三者联系起来看“历史”,进而理解“什么是历史”,就使人有新解。近代史家有人试图这样做,虽然没有坚持下去,深入下去,但这种为发展民族史学的努力,就足以使人钦佩。《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总论”中有相关的内容,以后还会再讨论。中国近代史家有的从民族史学理论中、从过去的经史子的学术中,挖掘出有价

① 参见拙作《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卷》,黄山书社 2005 年版,第 17 页注①对“史学近代化与现代化”所作的说明。

② 关于“话语权”的问题,经济、外贸、网络、媒体方面人士议论较多。近年来,包括史学在内文化的话语权问题也开始为人们关注。“话语”提法,与西方的话语理论有相似地方,但与历史思维的途径,又不尽一致。

③ 参见拙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第三节《20 世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作举隅》,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值的认识。他们成功与不足甚而出现某些谬误,都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开启了思路。我们重视结果,但更重视近代学人在建构近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上,努力参与世界范围诸子争鸣的精神。

中国学人向西方学习是很用功的,是相当谦虚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走向世界,寻找思想武器,在输入西学上,做出的业绩相当惊人。

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①。中国学人为了翻译西方学术名著,有的学者穷毕生精力,有的是师生数代人的努力,做出了大量贡献^②。何炳松在译介、述编西方史学史、历史研究法等方面做的工作,是相当辛苦,很有成绩的。这些工作对发展民族史学同

样是重要的。今后还要继续做好。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史学研究面向世界,译介的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作品或文集相当多^③,有一批重要作品^④。

此外,中国学人用中文写出一批西方史学史、欧洲史学史及历史哲学之类的著作,还出版相关的文集。这些作品对扩大学人的眼界很有益;新的思潮,新的观念被介绍进来。有关的史学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成了热门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

——上个世纪,重视翻译、介绍中国民族史学思想、史学理论著作的西方学人,有几人?

——就是我们自己的学人,把中国史学向世界介绍的有几人? 我们学贯中西的学人,在译介西方学术作品的同时,能以一定的精力向

① 据相关材料,1902 年张元济先生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所长以后,以开发民智、传播科学文化为主旨,积极组织翻译出版世界名著。仅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包括蔡元培所译科培尔的《哲学要论》等,在两三年内就印行了 90 多种。20 年代初,《名学浅说》已印行 11 次,《天演论》更印行了 20 次之多。1921 年王云五先生接任商务编译所所长,继而担任商务总经理后,此项译事更大有进展,逐渐形成系列,并汇编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在 1936 年前印行的两辑《万有文库》中,就有“汉译世界名著”200 余种。建国后,为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介绍国外学术文化的工作逐渐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制订了“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规划”,并于 1956 年开始出书。1958 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后,当年拟订了“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书目”,共选书 1614 种。到 1966 年,已出书近 300 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商务印书馆译介世界名著工作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82 年,为纪念建馆 85 周年,开始分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系统地了解、研究历代思潮和各种流派,更好地进行学术文化积累,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如果加上各地各类出版社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总数在千种以上。

② 我们仅读 2003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4 卷本《柏拉图全集》的“中文版序”、“中译者导言”,就使人相当感动。

③ 参见于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外国史学理论

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 年第 4 期;张广智:《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史学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此前有刘泽华主编的《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等。

④ 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杨生茂选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的《新科学》,茹科夫的《历史方法大纲》、《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华夏出版社的:巴尔格的《历史学的范畴与方法》,米罗诺夫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伊格尔斯主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哈多克的《历史思想导论》,雅斯贝斯的《历史起源与目标》,摩尔的《民主专制的社会起源》,托波尔斯基的《历史方法论》,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有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有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勒高夫等主编的《史学研究的新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的《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以及《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等。三联书店在 1956 年就译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后有德雷的《历史哲学》等。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维科的《新科学》等。

世界传播中国传统史学的,又有几人?

——难道中国真的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历史大国”?

在这样不对等的学术环境下,我们古代讨论重大史学理论命题,自然不可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不可能提到桌面上来。综合这些现象,我们称之为到了近代,中国民族史学的话语权是失落了,说得好听一点,是话语权转移了。这种变动,近来有的学术文章,注意到了^①。

百年以来历史学科发展史的讨论,希望能激发起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学与传统史学的愿望,希望不但要输入外国史学,而且要在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思想上下功夫,并且把中国丰富的史学,推向世界,进而在新的高度上建设我们民族的历史学。

振兴民族史学的追求

一、振兴民族史学的追求

一百年来,不少老一辈中国史学家在西方学术传入后,西方学术处于强势的状态下,充满民族的感情,渴望史学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渴望民族史学振兴。梁启超在 1902 年写的《新史学》就是为进行史界革命而写的檄文。在总结出旧史学的弊病以后,他说: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惟大。新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梁氏鼓吹的新史学从表面上看,是否定传统史学,但从根本上说是希望把新史学作为救国大事,把新史学作为振兴民族的大事。

何炳松在 1927 年初写的《历史研究法·序》中,说到历史研究法时,指出中国研究史法著作不多,但不必妄自菲薄,说:

唯吾国史籍,虽称宏富,而研究史法之著作,则寥若晨星。世之习西洋史者,或执此为吾国史家病。殊不知专门名家之于其所学,或仅

知其然而终不知其所以然,或先知其然而后推知其所以然。此乃为中西各国学术上之常事,初不独吾国学者为然也。西洋史家之着手研究史法也,不过二百年来事耳。然如法国之道诺(P. C. F. Daunou),德国之特罗伊生(J. G. Droysen),英国之夫里门(E. A. Freeman)辈,或高谈哲理,或讨论修词,莫不以空谈无补见讥于后世。至今西洋研究史之名著,仅有二书。一为德国格来夫斯法尔特(Greifswald)大学教授朋汉姆(Ernst Rernheim)之《历史研究法课本》(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出版于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一为法国索尔蓬(Sorbonne)大学教授郎格罗亚与塞诺波(Ch. V. Langlois and Ch. Serignobos)二人合著之《历史研究法入门》(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出版于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两书之出世,离今均不过三十余年耳。

吾国专论史学之名著,在唐有刘知几之《史通》(中宗景龙时作),离今已一千二百余年。在清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乾隆时作),离今亦达一百七八十年。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唯吾国史学界中,自有特殊之情况^②。

他在《通史新义·序》中又说:

吾国近年来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是以努力于通史编纂者颇不乏人。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

① 关于“话语权”的问题,前有说明,近年史学界有的学者也感受到了,说:“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系统大体按照西学模式重新组装,而条理的形式各异,或是完全新增,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或是保留形式而改变内容,如史学,或是基本替换,如经学。其中史学是为数不多的中西均有的学科分类。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发达的史学,在进化论观念的笼罩下,国家的强弱与学术文化的优劣似成正比,各种学科都被视为造成列强强势的基因,因此西方的整体优势还是令趋新的学人将目光转向外部,寻求借助先进外力来改变落后的固有。”见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② 《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5页。

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偏而不全、似是而非之通史义例因之遂充斥于吾国现代之史著中。……一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诚不可谓非吾国史学界复兴之朕兆也^①。

在中西文化碰撞之下,他看到“史学界复兴之朕兆”。他希望在“若干年后,民族复兴,国家安定,文化工作日新月异,我如能和高佣先生、各位教授以及各位学生,促膝围坐,清茶淡酒,纵谈史学,回话当年,那末,我们目前所身受的一切艰苦都已得到无价的心灵的快慰了!”^②

同时代的学人李则纲指出,史学应当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要使中国民族史学进行更新,开新局,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正急向转型方面趋走,许许多多的学问,固然发生动摇,而最难支危局的,更莫如历史学。我们知道历史这件东西,曾做过上帝和僧侣的傀儡,曾充过帝王和贵族的侍役,曾被除颂为帝国主义的护符。然而时代的转轮,已准备把历史学过去的一切的劳绩和光荣吞噬下去了。历史学旧有的产业和荣誉,既势难持续;就历史学本身讲,也应和转型期的时代协调,另辟新的局面,肩起人类的重大任务,为社会作学术的前锋”^③。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文化史角度审视史学。吕振羽指出,在对待文化传统上,有两种倾向要反对,一种是所谓的文化贩运主义,另一种是文化闭关主义,即文化上的排外主义、或者说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新史学家要以世界史的眼光对待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他说: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要“迎头赶上”,不再走欧美所走过的道路。这对于我们的民族新文化来说,便将不同于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的文化,将是比它们进步的一种新型的文化,“迎头赶上”便是我们解决这一矛盾问题的实践方针^④。

吕振羽借用孙中山的话,就是要使我们民族文化“迎头赶上”,从而把文化的开放与先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今天重读这段话,我们仍然受到很大的启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创造自己的新史学,重视史学的民族性。在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经验时,白寿彝先生指出,李大钊、郭沫若与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他称赞侯外

庐的建树,强调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的贡献,说:

外庐同志的书,在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地位中应有它的特殊地位。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出版了很多,史学界几大家都已出来,并有不同的著作、不同的贡献。但有一点,外老是突出的,这就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抓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的^⑤。

在纪念侯外庐同志的会上,白先生说:我们今天纪念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应该把他初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的工作继续下去”^⑥。

总结好我们民族史学遗产,研究史学史,进而建设好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振兴民族史学,走向世界的正确的道路,他说:

要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站在世界前列,不能一般化,真要拿出东西来。我们国家的历史最长,史学一向是最发达,现在不应该落后,应该大步往前走^⑦。

振兴民族史学是海峡两岸学人的共同心声。1993年我国台湾学人杜维运开始撰写三卷本的《中国史学史》,他感慨地说:“世界两大系统的中西史学,是中西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的产物,相去绝远,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声息。十九世纪末叶,西方军事、政治、经济势力,挟带西方史学涌入中国,中西史学由分途发展开始合流。唯我独尊两千余年的中国史学,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冲击,模仿西方史学体

① 《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86页。

② 《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704页。

③ 《史学通论·序》,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2页。

④ 《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2页。

⑤ 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416页。

⑦ 《中国史学史论集》,第394-395页。

例,采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以从事于研究国史,撰写国史,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风气。迄于今日,已极少有人否定西方史学的重要性,怀疑中国史学的价值与成就者,则大有人在。素有泱泱大国民之风的中国,在史学上采取了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开明态度,这应是史学上的盛事”^①。

有一个重要问题要提出来。近代史学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流派,但总体上说,振兴民族史学则是共识。可以柳诒徵为例,有的文章指出,“柳诒徵之所以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其用意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可见他仍希冀以思想文化的方式解决当时的外患问题。……柳诒徵提出中国文化的特质,如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加以分析,或许比较触摸到事实的真相,而非表面上的传统与西化之争。”^②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说:“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③ 还有的学人看到中西史学的差异,提出自己的主张,“我们不妨努力提出有特色的本土观点,但同时与国际学术强权维持对话”^④。

总之,振兴民族,振兴民族史学,推进民族史学走向世界,是海峡两岸绝大多数学人的共同心声。各家的立足点虽有差异,但共识是重要的。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是史学话语权问题。

二、对西方学人扭曲、贬损中国民族史学的抗争

近代西方学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扭解、贬低,引起中国史家抗争。很多留学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感受更深,反映也最为强烈。

还是在上个世纪的 60 年代,杜维运在英国剑桥大学问学期间,留心中西史学的比较,带有民族情感,撰成《与西方史学家论中国史学》一书,这本书初版于 1981 年,作为中国史学家,全面系统地与西方就中国史学进行对话的专书,这是第一部。

作者把西方史学家分成三类,分别地分析

这三类史家对中国史学的态度。一是所谓西方正统史学家,“在欧洲,治欧洲史以及欧洲国别史的史家,往往被视为正统史家(academic orthodox)”。这一类史家观念偏狭,历史的视线不够广阔,欧洲以外的世界及其历史,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占重要地位。西方正统史家论中国史学,极尽蔑视嘲笑之能事,偶而也有称赞的语句,但少能触及中国史学的精华^⑤。

第二类是西方非正统史家。“所谓非正统史家是治亚洲、美洲或非洲史的西方史家。这些史家视野比较开阔,观念较西方正统史家开明”,但他们对中国史学了解得很少^⑥。

第三类是西方汉学家。杜维运以为,这些汉学家有学术上的宽容,而又略具基本知识,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他们论中国史学,

- ①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 1 册,台北三民书局 1993 年初版,第 4-5 页。
- ② 彭明辉的《历史地理与现代中国史学》说:“五四时期的学术思想本来即存在矛盾之吊诡,以反儒学传统为中心的讨论,往往所忽略了五四人物反儒学之终极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因而反儒学传统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彭文收进《幼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4 页。
- ③ 《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6 年修订版,《引论》第 3 页。
- ④ 卢建荣:《历史的再思考‘导读:后现代历史学指南’》,台北麦田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 页。
- ⑤ 这些史家有汤普森(J. W. Thompson)、理查森(Alan Richardson)、艾尔顿(G. R. Elton)、卢克斯(John Lukacs)、蒲朗穆(J. H. Plumb)、葛兰特(Michael Grant)、马尔威克(Arthur Marwick)、白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等。
- ⑥ 这些史家有奈芬司(Allan Nevins)、瓦尔班德(T. W. Wallband)、巴容(Jacques Barzun)、卡耳(E. H. Carr)、魏吉瑞(A. G. Widgery)、巴拉克劳甫(Geoffrey Barraclough)、麦尼耳(W. H. McNeill)、傅尔(N. E. Fehl)、但斯(E. H. Dance)。

有时能发表极为珍贵的意见^①。

一些西方学人即使在谈到中国古代史学具体问题时,也带着傲慢与偏见,说,中国人从事于农业及手工业,简单的生活使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出现问题,他称之为“寂静主义”(杜书第 119—120 页)^②,也就是说,中国民族史学没有活力,没有思想。到近代,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不少,但“中国学者受西方历史的特殊训练者绝无仅有”,所以欧洲人、美国人、澳洲人、日本人,甚至非洲人能写出中国历史书,但中国人却不能写出有水准的西洋史,“能有达到大学水准的西洋历史研究者,真如凤毛麟角”^③。

杜维运的这本书到 1993 年,已经出版了三版。这里,我们不是对杜氏的著作全面评论,重要的是,他在史著中,批评西方某些学人的偏见,表达出振兴民族史学之心。

杜维运在《中国史学史》第三册中再一次阐明自己的心愿,他在这本书的结篇中说:

平情而论之,中国史学自有其缺陷,然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史学遥遥领先西方史学,是不争的事实。十九世纪以后,西方史学进入黄金时期,中国史学趋于式微,也是史学的潮流。当今之时,中国史学界以广阔的胸襟,恢宏的眼光,综合中西史学,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则超越的宏愿与美善的史学,将悠而出现。经世的大业,不朽的盛事,尽在于此,愿与国人共勉之^④!

这里还应当指出,汪荣祖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在中西史学比较上,扎实地进行探索,他出版的《史学通说》^⑤是以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中的重要中国传统史学命题,可以说,这是以中国民族话语方式,进行中西史学比较的第一部专书。作者于 2002 年又出版了《史学九章》,这本书后面几章对中国史学作出了深入研究,其第五章是:《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全面评述了西方学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注意从史学的属性讨论问题,他批评西方学人把中国传统史学简单地归为“儒家史学”,又认为这种史学从属于政治,是道德的工具,史学没有独立品格,因此也就没有西方的“史学意识”。作者说:

近代西方独霸世界,在学术圈里也不免有文化的天朝观,认为一切现代学术的根源都在

西方,所有非西方学术,莫不属于前现代的古文明。所以,不少著名的西方史学家,虽不曾真正接触到中国传统史学,就信心满满地说,历史意识(historical-mindednes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乃西方独有的东西,故史学史必须追溯到希腊与犹太人之根,无论印度、中国皆属“无史”(ahistorical)。有不少西方史家认为,西方到 19 世纪之具有近代史学意识,就像他们于 17 世纪已具备了科学意识一样,而亚非文明在过去既无历史意识,至近代欧化,才接受了近代西方科技,以及获致近代西方的史学意识,并以欧洲的史学概念与名词重新规划亚非国家的历史^⑥。西方学人学术偏见是“西方独霸世界”意识的体现,“在学术圈里也不免有文化的天朝观”,通过“史学话语权”表现出文化上的霸权主义。

由此,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责难,具体一点说:一是史书“主观的褒贬有违客观”;二是

① 中国史学是西方说的汉学中的一项,如早期法国的沙畹(Edward Chavannes)等。在 1961 年编纂的《中日史家》一书(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中论及的学人有:浦立本(E. G. Pulleyblank)、毕斯利(W. G. Beasley)、房德龙(Van der Loon)、何四维(A. F. P. Hulsewe)、傅吾康(Volfgang Franke)、福赫伯(Herbert Franke)、杜希德(D. C. Twitchett)、戴密微(P. Demieville)、哥芮(J. Gray)、白乐日(E. Balazs)以及瑞特(Arthur F. Wright)等。

② Throughout their history the masses of Chinese have been occupied with agriculture and handicrafts. Their lives have been essentially simple and it is from this standpoint that we may understand their attitudes to history... The Chinese attitude to history may be called Quietist. (A. G. Widger,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From Confucius to Toynbee*, 1961, P15, 18.) (杜书第 130—131 页。)

③ 杜书第 124 页。(There hundreds of books on Chinese history written by Europeans, Americans, Australians, Japanese and even Africans. There are very few indeed authoritative studies in Western history by Chinese on the university or research level.)

④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 3 册,台北三民书局 2004 年版,第 529 页。

⑤ 台北联经出版社 1988 年版;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第 1 版,2003 年新 1 版。

⑥ 《史学九章》,台北麦田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7 页。

“御用史官替政治服务,失之真实”;三是“编抄史书无异剪贴簿,枯燥无趣”。汪荣祖逐项作了评述,指出以西方现代史学标准来评论中国传统史学,存在偏见。对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家看不清庐山真面目,只恐庐山仍在云雾缥缈间”^①。

我们民族史学具有特点,决定了中国史学思想是丰富的;而且在新世纪史学发展中,还具有重大的价值。

要深刻认识我们民族史学遗产在理论、思想上的重大价值,要看到民族史学不只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理论上的巨大魅力。实事求是地总结传统史学的理论,以建构具有民族特点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正是力图在这个领域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也是 10 卷《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撰述的旨趣。

传统史学的时代价值与史学话语权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赋予先进文化以民族的与时代的内涵。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有着十分丰富的史学遗产,在民族复兴的大业中,对民族史学遗产发掘整理、进行新的诠释。传统的史学命题,“史学话语”,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增添新的内涵。

进入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成为新时代的特征。但全球化趋向又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在信息、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都能体察这种趋势带来的影响,感受到它的震动。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这样的感受就更为强烈。尽管对全球化有不同态度不同流派,争论相当激烈,有极端主义者(hyperglobalizers)、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transformationalists)^②。但全球化是活生生的事实,无论是怎样的态度,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这样的潮流带来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不只是经济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同样遭遇到挑战,当然也是发展的机遇。

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研究、进一步发掘史学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在新世纪全球化趋势下,努力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坚持和发展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民族性的品格,是十分迫切

的任务。

当代中国史学问题,至少有两点要考虑,一是史学的时代性,一是史学的民族性。这是上一个世纪史学两个焦点,也是 21 世纪全球化趋势下,史学发展的两大中心问题。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应当把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起来思考,讨论中国史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发展的大趋势,讨论历史学建设问题。

史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史学观念更新,带来的是历史学大发展。

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站在世界前列。

传统史学的价值是明显的,可以举出几点来:

——历史变化的“趋势说”。在认识历史过程发展上,在认识全球化趋势上,这样的学说都具有重大意义。从韩非到马端临、王夫之,他们对这一理论都有重大贡献。

——历史盛衰论中的“见盛观衰”思想。历史本身就是盛衰变动的,盛中有衰,盛衰相互连接,衰可以复盛。一国一民族的盛衰又和周边乃至世界的盛衰变动相互联系。

——历史运动的通变观。时代不断发展,一个时代的历史经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借鉴历史总是和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要注意现实的变化。

——认识历史兴衰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理念。

——风俗人心关乎国之盛衰的观点。时代的风俗是一件大事,不可忽视。

——关注历史前途的忧患意识。每一时代的史学家、学人,总是系念民族的兴衰荣辱,具有时代的责任感。

——天人相关的思想。历史发展总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孤立看社会发展要求,而忽视环境的因素,一定要受到自然的报复。等等。

^① 《史学九章》,第 161 页。

^②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再者,历史学的编纂思想与理论。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的论述,今天仍然有重大的价值。

还有就是,史料整理与考辨的方法论。历史文献学的思想相当丰富。

应当提到,历史文学的理论,是我们民族史学遗产宝贵财富。

最后要说的是历史教育思想。

而归结起来,有四大问题,有必要从“史学话语”层次上强调一下,从中可以体会到中华文化、中华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第一是天人关系的问题。这是历史的根本问题,涉及到宇宙观、历史观的相关问题,对于理解“什么是历史”或者说“何谓历史”之类问题,有更好的解喻,观察问题的视野更开阔。离开宇宙发生,局限在“人事”方面,又要对普遍的“历史”有准确的理解,难以办得到。他们往往只好偷换概念,把“什么是历史”的争论,换成“什么是人的历史”、或者“什么是有文字以后的历史”。逻辑的“同一律”在争论中,也被置之脑后。

天人关系讨论,表明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分不开,生态、环境、资源、地理等,任何一项,都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至于全球的社会历史紧密相关。

中国早在汉代,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家第一项大任务提出来。西方还说中国民族史学没有思想,没有历史意识,真不知从何说起。

第二是历史盛衰的问题。同样是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基本点。历史是一个盛衰变动过程,盛衰变动是盛衰不断变动,盛衰又是相互包含,见盛观衰,这些对于世界史学都是有贡献的。无论是通史、断代史、专史,

乃至妇女史、性别史、环境史、风俗史等,仍然要观察这个天地内相关事项的变动,用英文比较形象的说法,是“ups and downs”,是上升与下降,历史事物总是在这样态势下表现出来,人们从中思考,得出有益的认识。事情就是这么清楚展现。

第三是学术创新思维。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创新的意思得到最清晰地表述,提倡“成一家之言”和“独断之学”的精神,并且指明创新的途径。

司马迁在六家要旨中,以《易大传》学术的基本思想,作为他的学术信念:“《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法、名、墨、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耳。”史学迅速成为一门发达学术,有其重要原因。有的西方学人还说中国史学中历史意识,除偏见之外,大约他们没有读,或者压根读不懂中国史学名著。

第四是忧患意识。这是民族向前发展的清醒意识,也是史家的时代感与责任感的体现,是史学家从事史学工作的出发点。

此外,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史料学命题、史书编纂法、历史教育思想,等等,这些我们民族史学的话语,难道没有价值,不值得讨论?传统史学话语命题的研究,对于丰富、推进西方史学理论,也是有益的。

为了建设新世纪的史学,在吸收世界上先进文化的同时,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重视民族史学的话语权,对我们民族史学的丰富遗产进行总结,使民族史学走向世界。

作者简介:吴怀祺(1938—),男,安徽庐江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汪谦千